

以舞为媒 广交四海朋友

——贾作光忆新中国早期对外文化交流

本报记者 毛莉

每次来到贾作光老师的办公室，都会被满满的一墙照片所吸引。奔腾的骏马、凌空的鸿雁……一张张老照片记录下了贾作光人生各个阶段的舞之身影，无论是15岁的年少之时，还是86岁的耄耋之年，我们始终能够在起舞的贾作光脸上看到一种夺目的光彩。作为新中国舞蹈事业的开拓者，贾作光的舞蹈生涯不仅仅是属于他个人的生命体验，很多时候还与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事业紧紧交织在一起。非常幸运，我们“岁月如歌——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早期记忆”栏目采访组有机会采访了贾作光老师，聆听到了新中国舞蹈艺术早期对外交流的历史片段。

难忘的经历实在太多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主要是选派具有民族特色、丰富多彩而又通俗易懂、较少语言障碍的民间歌舞、杂技等团组出国访问演出。在这个过程中，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把中国的民族民间舞蹈首次带到了国际舞台。当回忆起多次随政府代表团参加当时中国主要的对外交流活动——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经历时，86岁高龄的贾作光一口气不喝，一口气不停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就像万花筒般，从贾作光的脑海里不断跳出五彩缤纷的记忆片段。“难忘的经历实在是太多了！”贾作光不停地发出这样的感叹。

其实，早在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贾作光就随解放区跟随中国青年艺术团，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了第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他与吴坚、叶杨、王昆合作编导的民族民间舞蹈《大秧歌》获特别奖；他参加演出的另一个汉族民间舞《腰鼓舞》同时获得了特别奖，这是中国民间舞蹈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

新中国成立之后，贾作光又带着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多次出国交流演出，用浓郁民族风格的舞蹈艺术展示了新中国的风采面貌，获得了许多国际奖项。其中，1955年，在波兰华沙举行的第五届世界青年节上，贾作光编排表演的《鄂尔多斯舞》更是俘获了评委和观众的心，一举拿下了当年的一等奖。《鄂尔多斯舞》是中国获得第一个国际大奖的蒙古舞，但并不是唯一的一个。1962年贾作光创作、莫德格玛首演的《盅碗舞》在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八届世界青年节上夺得了金质奖章。

中国艺术团充满热情，向往美好的表演就像一团火，走到哪里就燃烧到哪里。当时，只要一看到五星红旗，当地群众都会竖起大拇指：“中国！毛泽东！中国！毛泽东！”50年前那些欢呼的声音、那些热烈的掌声、那些热情的亲吻、那些激动的泪水从没有贾作光的记忆里消失。每次表演结束之后，当地热情的姑娘总会把他亲个满脸“红唇印”，他被紧紧簇拥在人群中，躲也没处躲，常常被弄得哭笑不得。当地群众还常常主动帮着搬运行李，人山人海的群众在车站为中国代表团送行，中国代表团所到之处都被簇拥在各国人民友好善意的海洋中。贾作光说，能够得到这样的尊重，是他出国之前并没有想到的。当时十几岁的贾作光亲身经历过东北沦陷时的悲惨生活，他清楚地知道作为亡国奴，中国人曾没有何尊严可言。“外国人对我们那样地热情友好，都是因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都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在国外的日子，贾作光心中常常不由自主地升腾起一股火热的爱国之情。这种强烈的爱国热情，这种强烈的荣誉感使命感，驱使包括贾作光在内的所有中国代表团成员克服了当时很多困难。贾作光还记得1951年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节，刚到西柏林的时候，就遭遇了一个“下马威”——西柏林街头悬挂了大幅宣传漫画，是一个中国女孩子满身爬满臭虫的形象，污蔑中国人脏。中国代表团并没有因为反华势力的猖獗而退缩，大伙儿在柏林市政府门前更加卖力地跳起了《红绸舞》；包括贾作光在内的从全国各个艺术团选拔出来的优秀舞蹈演员高举着“火把”跳着欢快的秧歌，瞬间，“火把”变成了红色的长绸——如火龙飞舞，矫健的舞姿与“火龙”交相辉映，洋溢着青春活力。西柏林被这片红色的海洋撼动了，他们撤去了污蔑中国的漫画，当地群众纷纷为我们的演员们送水、送牛奶。

中国代表团不仅在艺术表演上竭尽全力为祖国争光，在日常的生活中，他们也时刻牢记他们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大伙儿都有极强的组织纪律性，在宾馆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吃完饭后收拾得干干净净，不不高声喧哗，他们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带到了国外。讲文明、懂礼貌的中国

四天就给他留下这个永久的痕迹。面痕的刻法，不同的部族有不同的规矩和讲究，其特定的含义和特定的仪式都有很严谨的规定。在漫长的人类活动发展中，这种刻面形式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并在演变中，被赋予了其他的功能，如审美的功能等等。而这些额外功能的出现，使得面痕文化在形式上更多样化，其象征意义也空前丰富起来。

在非洲，这种拥有“部落之印”之称的面痕文化，拥有相当悠久的历史，而且被许多部族所共同实施。尼日利亚北部的博尔诺州有一个叫做奇卜克的部落。奇卜克

逐渐消失的非洲刻面艺术

江 东

人的肤色比当地其他部落的人的肤色要浅得多，因此人们称他们是“红种人”。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肤色较浅，他们的面痕则更突出、更醒目。

刻在奇卜克姑娘和妇女脸上的面痕，归纳起来有两种模式。一种的名字让我们中国人听上去有些恐怖，叫做“放血式”。奇卜克人认为，如果体内血液过多，则容易致病，所以当有人生病时，人们就给他放血。另一种的名字又非常好听，叫做“面美式”。顾名思义，其目的是为了增强女人們的美感，因而多用于年轻女孩和妇女的面容上。

在乡村，“刻面”是一种技术活，不是人人都可随意而为之的事情，人们称作这种活计的人为



1949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第二届世界青年节上表演《腰鼓舞》的演员合影，贾作光为后排左起第6位。

代表团走到哪里都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中国是有礼貌的国家。”

轻伤不下“火线”

除了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外，贾作光还参与了当时很多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活动：1952年“中蒙友好年”期间，他以中国艺术团副团长的身份赴蒙古人民共和国演出；1953年，任内蒙古自治区赴朝鲜慰问团副团长身份率团出访朝鲜；1957年，任中国艺术家代表团副团长再次赴朝访问演出；1959年，任中国舞蹈代表团副团长兼秘书长赴蒙古人民共和国访问做表演示范并讲课……每一次的出国访问演出，都有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

贾作光说每次去蒙古人民共和国都觉得格外亲切。在乌兰巴托参观、演出、联欢，大家像亲人一样地拥抱、亲吻，一起唱歌，一起跳舞，几乎每天都沉浸在欢乐友好的气氛当中。

通过双方的表演交流，贾作光发现我们的蒙古族舞蹈跟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舞蹈，在共性之中还是有不同的个性：我们的舞蹈比较剽悍，融入了较强的时代感；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舞蹈则更多地保留了民族的传统。

那段岁月让人难以忘怀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它们在贾作光的记忆闸门打开之时，都争先恐后地涌出来。“金日成操着一口东北话，在人群中观看了内蒙古的

“刻面师”。刻面师的工作不限男女，只要有技术、有耐心，都可以从事这个工作。但在报酬上，男女同工不同酬。男人刻一次面可以获得200泰拉的报酬，女人则很难获得报酬，最多不过是被刻面孩子的家长上门为其劳动，多是磨磨玉米面等的杂事。

刻面的过程对陌生人而言是很恐怖的。一般来讲，其深度为1/16英寸，流出的血被认为越多越好，如果有时流出的血被认为是不够多的话，则需重新再刻。另外，在血尚在流的时候，就要立即把木炭灰和绿靛叶磨成粉状的混合物涂抹在刀痕之上。几个小时后

待创伤面逐渐干凝后，要用清水把脸洗净，然后，每天都要用由酪脂果和花生仁榨出的油拌上牛油擦拭刀痕处，直到刀口痊愈为止。很多部落的刻面过程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特别是那些为了审美而实施的刻面术。比如奇卜克人从四五岁开始做第一次刻面术，以后直到成人还要不断实施多次。有的人到成年时被实施了20次或30次的刻面术，也不是奇谈。当然，有了第一次疼痛的经历，多数孩子都极不情愿再次接受刻面之苦，而大人就得强迫他做，有时不得不采用五花大绑的方式。不过还有一种情况听起来也蛮有趣，有些老妇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实施刻面术，为的就是一个“美”字。

歌舞节目，给慰问团很大的鼓舞。”尽管时间已经过去50多年，说起赴朝慰问演出的情景，贾作光依然滔滔不绝。那是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已打了3年，在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中国政府组建了由贺龙元帅任总团长的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贾作光跟随布赫率领的内蒙古自治区慰问团也参与其中。而当时志愿军战士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主义精神、舍己为人的国际主义精神深深地打动了贾作光，轻伤不下“火线”成为贾作光始终坚持的原则。有一次在表演过程中，贾作光一不留神，把脚踩到了用枕木搭成的舞台地板的缝隙中，但音乐还在继续，节奏不能停止，贾作光硬是把脚扯出来，光着脚，流着血，满怀热情地继续表演下去。演出非常成功，当地的老百姓又是送玉米，又是送打糕，对我们的演员非常热情。当时，金日成也多次观看了演出。

光也经过了漫长的摸索期。贾作光从小就得到日本现代舞大师石井漠的亲授，很早就接触到了芭蕾舞、现代舞，可当时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舞蹈也应有民族个性。贾作光最开始创作《牧马舞》时，只是把西班牙舞蹈硬套在了主观的舞蹈形象之上，动作、姿态都是西班牙式的。牧民们看完他的表演之后，都说他像跳大神的，并不认可那是蒙古族舞蹈。当时的贾作光还不太服气，觉得是牧民们不懂舞蹈。可随着后来越来越多的对外交流，贾作光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精彩纷呈的世界艺坛上，一定要有能代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舞蹈，能让世界各国人民一看就知道，这是中国的舞蹈。

创新和发展民族舞蹈

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舞蹈事业的一个繁荣期，这种繁荣与新中国早期频繁的对外文化交流是分不开的。“在促进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同时，启发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很多作品是在借鉴和吸收外来舞蹈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如何对待外来文化，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贾作

光也经过了漫长的摸索期。贾作光从小就得到日本现代舞大师石井漠的亲授，很早就接触到了芭蕾舞、现代舞，可当时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舞蹈也应有民族个性。贾作光最开始创作《牧马舞》时，只是把西班牙舞蹈硬套在了主观的舞蹈形象之上，动作、姿态都是西班牙式的。牧民们看完他的表演之后，都说他像跳大神的，并不认可那是蒙古族舞蹈。当时的贾作光还不太服气，觉得是牧民们不懂舞蹈。可随着后来越来越多的对外交流，贾作光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精彩纷呈的世界艺坛上，一定要有能代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舞蹈，能让世界各国人民一看就知道，这是中国的舞蹈。

在历次出国的过程中，贾作光有机会接触到了很多有名的艺术家，看到了当时一流的舞蹈表演。这些经历刺激着贾作光不断思考：怎样才能把人家优秀的东西合理地为我所用？观看乌兰诺娃演出的《天鹅之死》让贾作光深深体会到了芭蕾舞的极大魅力。芭蕾舞的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让贾作光十分羡慕，他当时就在想，中国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芭蕾舞？中国的民族舞蹈如何像芭蕾舞一样规范起来？人家是怎样弘扬民族舞蹈的？在这些问题上，前苏联民间舞蹈之王莫伊塞耶夫给了贾作光极大的启发。莫伊塞耶夫创建了前苏联第一个专业民间舞蹈团，在深入研究苏联民间艺术——音乐、舞蹈、服装以及民族风俗的基础上，对民间舞蹈进行了整理加工，把苏联民间舞蹈与经典芭蕾舞完美融



合，创造了大量风格鲜明、形象生动、具有深刻表现力的民间舞蹈舞台作品，使民间舞蹈成为了舞蹈学一个重要分支。就这样，一点一滴的外来文化的养料在贾作光心里慢慢发酵着，一种要尝试把芭蕾舞民族化的冲动在贾作光心里慢慢滋生着。

事实上，芭蕾舞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受到了格外的重视。1954年，新中国第一所正规的培养民族舞与芭蕾舞专业人才的中等专业学校——北京舞蹈学校（今北京舞蹈学院）诞生。首任校长是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副校长陈锦清。当时的北京舞蹈学校先后聘请了苏联舞蹈专家前来任教，通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的教员、演员、编导等方面的芭蕾舞人才。1955年，贾作光参加了由苏联专家查普林主持的第一期舞蹈编导班。结合出国的所见所闻、贾作光的进步非常快。他系统学习了编导技法，不仅把学习到知识运用到对蒙古舞的提炼、规范当中，他创作的小型舞剧《幸福的花朵》还开创了芭蕾舞和中国蒙古舞相结合的先河。这对《红色娘子军》等作品实现芭蕾舞民族化的真正成熟，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引领作用。

BMW 助力中国儿童交通安全教育

本报讯（记者郭素娥）11月3日，几百名小朋友的欢歌笑语把中国儿童中心变成了一片快乐的海洋。2009 BMW 儿童交通安全训练营在这里举行闭营仪式，庆祝5周年活动圆满落幕。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康思远在仪式上发布了今年训练营活动的成果，“BMW 儿童交通安全拍手歌MV”也首次和小朋友们见面。由5名小朋友扮演的训练营吉祥物“小熊安安”，还将一份特殊的“礼物”——BMW 儿童车贴设计比赛优秀作品画册送给了康思远，以感谢BMW5年来对儿童交通安全教育的投入和贡献。据悉，今年约有10万名儿童从BMW 儿童交通安全训练营中受益，5年来累计训练儿童数量已突破20万。今年年底，BMW 还将向全国幼儿园赠送儿童交通安全拍手歌MV光盘，进一步扩大受益儿童的范围。

贾作光简历

贾作光，国家一级编导、一级演员、文化专员。1923年4月1日出生于辽宁沈阳。1938年考入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向日本舞蹈家石井漠学习舞蹈。1947年随吴晓邦到内蒙古解放区，参加内蒙古文工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作表演了《鄂尔多斯舞》、《盅碗舞》、《挤奶舞》等作品，先后在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获得金质奖章、一等奖和铜奖。1976年后，他编排出《彩虹》、《喜悦》、《鸿雁高飞》等舞蹈。《牧马》、《鄂尔多斯》、《海浪》荣获“20世纪华人经典舞蹈作品金像奖”。他创作的舞蹈，许多成为中国歌舞表演团体的保留节目。他曾先后赴蒙古、前苏联、美国、法国、波兰、德国、朝鲜、奥地利、巴基斯坦、尼泊尔等40多个国家访问演出。

中演票务通 “票务高速路”力助十一运会创票房神话

十一届全国运动会已经圆满结束，而一路飘红的票房依然让人津津乐道。据统计，除开闭幕式以及9月之前结束的冰上、男足U20、网球团体等项目，本届赛会共售出赛事门票超过100万张，实现收入逾1600万元，创下了历届全运会票房最高纪录。

“票务高速路”深入人心

组委会票务中心主任李国琳分析，十一运会之所以能够创票房“神话”，是因为有了平民票价的政策和先进的售票系统这两大法宝。

为了让民众能够方便、快捷地买到全运会门票，十一运会引进了国内最先进的“中演票务通”电子售票系统。“中演票务通”在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的情况下，仅用短短的两周时间就把售票系统和打票机铺设到山东省500个售票网点，实现了门票销售的联网和实时管理，确保每个县(市、区)都至少有一个销售点。同时，“中演票务通”利用自身已有的平台优势，还推出了网上购票、团体购票热线，从而

欲作全国票务第一

文化产业的发展有3个策略：

构建了网点、网站、客服三位一体的立体销售格局。这是全运会历史上首次实现联网售票的创举，打造出了一条真正的“票务高速路”。谈起“中演票务通”所提供系统的优越性，组委会票务行业进入了一位负责人由衷地称，正是由于抛弃了传统的人工售票方式，本届全运会的售票工作才做到了省心、省力、安全、高效，并最终确保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其实，通过与十一运会的合作，“中演票务通”也从中获益良多。本届赛会是奥运会后国内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赛事，借此契机，中演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品牌影响力，建设了“票务高速路”的概念深入人心，其直接效果已经显现。距下一届全运会虽然还有4年之遥，但是东道主辽宁的有关方面已经主动和中演接触，就下届赛会的票务合作展开洽谈并达成了初步意向。

欲作全国票务第一

文化产业的发展有3个策略：

品牌策略、渠道策略、主体策略。这是中国进一步发展文化产业、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基本路径。其中，渠道是文化产业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作为文化产业最重要的渠道之一，中国的票务行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亟待更新换代、重新布局。票务网络系统作为一种以高科技为支撑的文化服务体系，是服务文化消费、引导文化市场、拉动文化内需、整合文化资源的重要平台，是与出版发行、电影院线、广电传输网络并行的中国文化产业四大渠道之一。

2008年，国家发改委、文化部、财政部等九部委在联合发布的《通知》中，明确了“建立全国文化体育电子售票系统，打造统一的涵盖文艺演出、体育等领域的公共票务平台”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指导方针。

其实，在相关政策方针出炉前，隶属于中国第一家大型国有对外文化企业集团、文化体制改革的排头兵——中国对外文化演出集团的“中演票务通”，一直以来设立的目标就是打造大型连锁超市概念的票务营销网络，

贝宁学员中国之旅 感触深

本报讯 11月4日，贝宁中国文化中心邀请获得文化部外联局2009年度“奖学之旅”优秀学员举办了一场“发现中国”报告会。文化中心汉语学员、贝宁阿波美卡拉维大学部分大学生和科托努公众90多人出席了报告会。

报告会由曾在中国留学10年的莫里斯博士主持。现为阿波美卡拉维大学德语系讲师的德国文学博士、中心汉语学员阿格萨维和大学生、武术学员阿兰贡在报告会上交替做了精彩的发言和介绍。阿格萨维学习汉语刚刚一年多，而阿兰贡是一位习武15年的武术学员，他们都对此次中国之旅印象深刻，感受强烈。他们绘声绘色、图文并茂地讲述了在文化部外联局安排下的10天中国旅行的见闻。

报告会中，两位报告人特别向听众讲述了对中国人的爱国、勤劳的印象以及中国有关省、市的科学规划与发达程度。他们表示，在此次旅华过程中，不仅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同时还和参加该活动的来自于其他中心的学员结识和交流，交谈中印证了中国的发展和对中国文化对全世界的影响。（刘红革）

BMW 助力中国儿童交通安全教育

本报讯（记者郭素娥）11月3日，几百名小朋友的欢歌笑语把中国儿童中心变成了一片快乐的海洋。2009 BMW 儿童交通安全训练营在这里举行闭营仪式，庆祝5周年活动圆满落幕。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康思远在仪式上发布了今年训练营活动的成果，“BMW 儿童交通安全拍手歌MV”也首次和小朋友们见面。由5名小朋友扮演的训练营吉祥物“小熊安安”，还将一份特殊的“礼物”——BMW 儿童车贴设计比赛优秀作品画册送给了康思远，以感谢BMW5年来对儿童交通安全教育的投入和贡献。据悉，今年约有10万名儿童从BMW 儿童交通安全训练营中受益，5年来累计训练儿童数量已突破20万。今年年底，BMW 还将向全国幼儿园赠送儿童交通安全拍手歌MV光盘，进一步扩大受益儿童的范围。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 “我的非洲故事”征文

文化部外联局与本报合办
邮箱: whbgjb@163.com
电话: 010-64296360

起初，我并没注意到当地许多人脸上都刻有花纹，或者说应该说是看到了某些人的脸上刻有这样或那样的图案或线条，却没能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现象——面痕予以足够的重视。直到有一天，我们驻非单位里雇了一个从尼日利亚北方来的黑人雇员，才改变了我的这个

错误看法。新雇员名叫乌斯曼，富拉尼人，穆斯林。他的脸上除在左颊下部刻有一较长的线条外，在嘴唇两边还各刻有3道线条。这个像极了猫胡子的图案，先是我忍不住不禁，继而引发了我的好奇。经过深谈方知，原来非洲的面痕所包含的文化意义是不可小觑的。面痕，就是在面颊上留下的用刀刻过的具有特定含义和形态的印痕。很久以来，为了永久性地在部落与部落、家族与家族之间做区别，非洲人使用了这种古老而又原始的符号作为辨认方式。乌斯曼的老家在尼日利亚北部农村，据他告诉我，当地仍保存着刻面风俗，往往在婴儿诞生的第三